

中国人民解放军 军事通史

第六卷

军事文献出版社



在常德，贺龙采纳周逸群的意见，开办了政治讲习所，除军事课外，还开设了《中山主义大纲》、《社会主义大纲》、《世界革命史》、《资本论入门》等8门政治课程。同时，贺龙在所部开始设政治机关，在旅团、营、连配备了专职政治工作人员。经过这样的整训，部队面貌果然焕然一新。

看着身边朝夕相处的周逸群所做的一切，贺龙觉得他已经寻觅到了多年来寻觅的东西。他认识到共产党才是能为大众谋利益的党，中国的希望、革命的成功就寄托在共产党人身上。他想参加共产党。

他把想法告诉了周逸群。但当时中共中央有规定，在友军内部不准吸收高级军官入党，周不敢贸然表态，告诉贺龙：“共产党是不关门的，只要够条件，时机一到，一定会有人找你的。”

北伐军总攻开始后，贺龙率部出师，所向披靡，攻占澧州、公安，又挥师西进，攻克宜昌，斩获敌人两个师。1927年1月，进驻武汉地区，担负“捍卫革命中心”的任务。2月，贺龙所部升编为独立第十五师，贺龙任师长，周逸群任政治部主任。

5月，武汉国民政府第二次北伐，贺龙率部参加河南临颍、逍遥镇战役。由于表现杰出，独立十五师被誉为“战绩最大、声誉最高”的“钢军”，贺龙也成为威名赫赫的北伐名将。这从武汉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给贺龙的电报中可见一斑：

闻郑州围歼，继以开封克复，国军奇捷，举世罕见，公等运筹决胜，身先士卒，与诸将士忠诚用命，为党奋斗，胥于此战见之。捷电飞来，两湖民众，欢声雷动。……谨电祝捷，并祝努力。

战役一结束，独立第十五师扩编为第二十军，贺龙升任军长。

贺龙一回到武汉，立即陷入各种势力的包围之中：

唐生智派他的胞弟唐生明前来上门游说；

汉口卫戍司令李品仙也向贺龙大献殷勤；

蒋介石利用其参谋长朱绍良与黔军的历史渊源，秘密前来武汉，对贺龙封官许愿。

但是对于这些秋波、媚眼，贺龙统统没理睬，他已看透了这些翻



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政客，他热切地想见的是共产党的领导人。

一天，在汉口俄租界鲍罗廷公馆，周恩来专程来会见贺龙。得知周恩来来访，贺龙喜出望外，忙迎上去，热烈握手。

“久仰大名，逸群经常对我讲到你。钦慕之情正深，想不到在这儿能见到你！”贺龙真挚地说。

周恩来说：“将军逐鹿中原，屡建奇功，现胜利归来，恩来特来表示祝贺！”

7月10日，鉴于武汉政府的右转，对各地的武装工人纠察队的迫害愈演愈烈，为保存革命力量，中共中央请周逸群跟贺龙说，可否将鄂城、大冶等地的武装工人纠察队骨干编入第二十军。贺龙满口答应，并眉飞色舞地说：“我带了这么多年的兵，没有哪个上级给我补充过人员，连军饷也是层层克扣，肥了‘大脑壳’，苦了当兵的。现在党给我补充，正是‘及时雨’嘛！党信任我，工农群众愿意到我这儿来，这说明我们有一点点进步嘛！”

这样，在“山雨欲来”时，300多名处境险恶的共产党员、工人纠察队员、农运骨干，补充到二十军教导团，被保护起来。

7月16日，汪精卫放弃“犹抱琵琶半遮面”的伪装，公开全面走向反动。贺龙召开连以上干部大会，慷慨陈词：

革命到了危急关头，摆在我们面前的出路有三条：第一条是把队伍解散。大家都回老家去。第二条是跟着蒋介石、汪精卫去干反革命，屠杀工农兄弟。第一条是死路、自杀的路；第二条是当反革命的路，我们都不能走。我贺龙不管前面如何危险，哪怕刀架在脖子上，也绝不走这条路！第三条就是跟共产党走，东征讨蒋，消灭反动派，这才是革命的路，光明的路！我要跟共产党走革命的路，坚决走到底！诸位愿意跟我走的，我欢迎；不愿意的，可以跟我说，我送你盘缠钱，回到家乡替我问你娘老子好。可是有一点，谁也甭想拉走部队，如果有谁这样，休怪我贺龙翻脸不认人！

这个有着高爵厚禄的中将军长，在共产党面临失败，许多人避之犹恐不及时，坚定地站到了共产党一边。也由于贺龙一锤定音的话，



起到了稳定军心的作用，绝大多数官兵支持了他。

接着，贺龙以率部东征的名义，移师九江。

7月28日，周恩来亲自来到二十军指挥部，请贺龙这个不是共产党员的将军担任南昌起义的总指挥。同志的信任使贺龙非常的感动，他表示：“我一定万死不辞。不过，我们要快。我们这出戏可是‘杨排风出阵——连烧带打’呀！”

他的话，把刚刚赶来议事的叶挺也逗笑了。

令贺龙意想不到的，自己这个“烧火丫头”后来竟挂了帅印。

南昌起义胜利后，起义军南下。远征中虽打了一些胜仗，但情况非常不妙。然而就在这时，贺龙还是坚定地选择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路，他又一次提出了入党申请。这已是第几十次提出申请，他记不清了。

拳拳赤子之心终于感动了党组织。在8月底或9月初的一天，在瑞金，经周逸群、谭平山介绍，贺龙加入了共产党，实现了他的夙愿。

入党后，贺龙真诚地表示：“从此我指挥的军队是党的，我是党的人，党就是我的生命！”

他用他的一生来实践他的诺言。

●“我叫贺龙，龙归大海嘛！”

1928年1月16日上午，武汉关的钟楼锁在阴冷的雾中。几个商人打扮、气宇不凡的人，从容镇定地穿过街巷，从汉口街心直奔长江码头。途经一个道口，只见人们在围观一张布告，这几个人放慢脚步，其中一个老板模样的中年人趋前去看个究竟，布告上赫然写的是：“悬赏10万大洋，缉拿南昌暴乱的匪首贺龙。”中年人的脸上露出了一丝不为人察觉的轻蔑微笑。

此人正是贺龙。不过，此时他身穿名贵的狐皮袍，头戴海龙帽子，围着进口的宽羊毛围巾，戴着水晶墨镜，并且剃掉了蓄了多年的短髯，俨然是一位大阔佬。同行的周逸群则打扮成管账先生，其他随行人员卢冬生、施元和滕树生等也化了装。

南昌起义失败后，贺龙取道香港到了上海。

中共中央原决定派他与刘伯承、林伯渠等一起，前往苏联学习军事，但因一个秘密机关被破坏，身份暴露，未能成行。



其实，贺龙也不愿去苏联留洋，他想去农村建立武装。早在南昌起义前夕，贺龙就说过：“张发奎无用，怕失败。我不怕失败，南昌暴动无论胜利与否，我都干；如果失败了，我就上山！”南昌起义失败后，贺龙心里憋着一股劲，想回湘西卷土重来，他就不信打不败蒋介石。于是他向党中央提出回湘鄂西拉队伍搞武装斗争的请求。出于安全考虑，中央开始不赞成，但去不成苏联后，就同意了贺龙的要求。

在准备起程时，周恩来很关心他一路的安全。贺龙笑着说：“你放心好了，沿长江水路我有把握。我叫贺龙，龙归大海嘛！”两人哈哈大笑。

元月中旬，贺龙一行到达汉口，在武汉与湖北省委书记郭亮取得联系，原准备在汉口搞年关暴动，不料因暴动计划泄漏，无法实施，贺龙等遂包船前往洪湖。

在码头的栅子口，凶神恶煞的宪兵在搜查登船的旅客，贺龙镇定地来到宪兵面前，把身上的裘皮大衣一掀，说：“查吧！”宪兵一见他这打扮、这气派，就矮了三分，象征性地看了一下，便献媚地说：“老板，您走好！”

后来贺龙回忆这段往事说：“当时我还真捏了一把汗，因为我带有党的文件，还有枪呢。”

一路上很顺利，1月18日，船就到了洪湖边的新堤镇。当贺龙得知岸上只有敌人的一小股团防队伍，十几人，十多条枪，他心动了，说：“把枪搞来如何？”

周逸群说：“怎么个搞法？”

贺龙露出了笑容，说：“我去向他们借，你们只管拿。”

船靠了岸，贺龙、周逸群等大摇大摆地向观音洲走去。团防队长以为是大官前来视察，慌忙列队欢迎。

贺龙走到团防队长面前，摘下墨镜，说：“认识我吗？我是贺龙，特来借你们的枪！”

一听“贺龙”的名字，如五雷轰顶，团防队长吓得魂飞魄散。一个团防队员企图顽抗，卢冬生眼疾手快，一枪打倒。其他人纷纷举手投降，连喊饶命。

贺龙说：“给他开张收条，就说我贺龙借到队长大人10条枪200发子弹。”



第二天，进入洪湖，在监利县的反嘴，遇到了前来迎接的贺锦斋。

贺锦斋是贺龙的堂弟，南昌起义时任贺龙的第一师师长，是中共党员。在1927年11月奉命返回鄂西，他以三条驳壳枪起家，在荆江两岸点燃了武装斗争之火，此时已拉起了100余人的队伍。

贺龙到后，以贺锦斋的队伍为骨干，很快汇集了一支500多人的队伍，树起了“四十九路工农革命军”的大旗。在中共石首县委的配合下，工农革命军发动了“年关斗争”，在较短的时间里消灭了不少敌人，打开了局面。到1928年2月上旬，这支队伍已发展到1000余人。

2月下旬，贺龙、周逸群把荆江两岸的武装斗争交给石首中心县委领导，仍旧按原计划回湘西。

2月28日，贺龙回到了家乡桑植洪家关。“‘贺胡子’回来了！”这一消息立即像长了翅膀传遍了桑植。贺龙在这个穷乡僻壤是人民言之振奋、土豪劣绅闻之丧胆的人物，许多人一听说“胡子”回来了，就感到有了“主心骨”，马上赶来，其中一些是率队伍来归的：参加过南昌起义的王炳南、李云卿各带来200多人；贺龙的姐姐贺英也把她领导的队伍交给了弟弟。

经过贺龙、周逸群的宣传鼓动，仅20余天，就成立了以李良耀为书记的中共桑植县委，建立了3000余人的工农革命军，共产主义的“幽灵”就在这万山丛中扎根。

刚开始时，这支工农武装由于内部不纯，没有时间整顿、训练，凝聚力、战斗力并不强，几次失利，用贺龙的话说：“就像抓在手里的一把豆子，手一松一下子都散了。”在失利中，周逸群失散，去了洪湖；贺锦斋、黄鳌牺牲。

但贺龙不惧怕失败，他婉言拒绝了党中央要他去上海的好意，愈挫愈奋，在湘鄂边艰苦创业，将工农革命军改编为红四军，根据井冈山的经验，恢复部队建制，健全党的各级组织，把红四军铸造成为一支坚强无敌的战斗队。人员又很快发展到3000人。

1929年6月底，湖南警备军第一军军长陈渠珍令其下属向子云从永顺向桑植进攻，企图“一举摧毁之”。

向子云曾在贺龙的护法第二梯团当过连长，贺龙先礼后兵，写了一封信规劝向不要轻举妄动，“若置之脑后，来则送礼而已”。

向子云接信后微微一笑，心想道：此一时彼一时也，你贺龙现在



拿的是破烂家伙，去年湘军一个战斗力不强的旅就把你们打垮了，有什么了不起。他令团长周寒之带两个半营进攻，并扬言要捉个“活”贺龙回去领赏。

谁知，周寒之一伙刚到桑植县西的南岔，连贺龙的影子没见到，就被早已埋伏在那里的红军打得落花流水，死伤300余人，大败而归。

向子云气得暴跳如雷，大骂周寒之无用。他立即决定亲自出马，还向陈渠珍拍胸脯：“军座给我准备好5000光洋，我拿贺龙的首级来见。”

不过，为保周全，他听说贺龙有一支神兵，还是嘱咐参谋长给他准备了不少鸡、狗血，去灭神兵的神力。

7月1日，向子云就带着他的3000人马，气势汹汹地直扑桑植城。一小支红军在赤溪河畔抵挡了一阵，便“不支”而退。

向子云轻易占了这座空城，乐不可支，立即向陈渠珍报捷：“桑植一带兵匪可不日肃清……”

利令智昏的向子云做梦也没想到他已如笼中鸟，陷入了贺龙的天罗地网之中。

原来，这桑植城地势险要，一面临水，三面环山。贺龙组织部队撤退时将部分城墙拆毁，城门烧掉，把桑植变成一个难守的空城。当向子云的先头部队入城，后续部队也渡过澧水跟进时，贺龙派两个团攻城，另两个团拦腰把敌人截成几段。贺龙一声令下，枪声、杀声响成一片，漫山遍野的红军、赤卫队冲进山城。敌人乱作一团，而短兵相接的红军大显神威，刀光闪烁，敌人鬼哭狼嚎，来不及抛洒鸡、狗血，丢下满街东倒西歪的炮车，四散逃窜。

经过半个下午的战斗，歼敌一大半。向子云收拾部分残兵好不容易逃到赤溪河边，早在这里等候的一支红军又冲杀过来。敌人吓破了胆，纷纷投降。向子云抓住一只骡子尾巴想过河逃跑，一个浪头打来，不知去向。

是役，红四军3000人歼敌3000人，缴枪1000余支，自己只伤了几十个同志，因此，有人说：“贺军长真邪，真有办法。”

●“野鸡有个山头，白鹤有个滩头，红军没有根据地怎么行呢？”

为了实现把湘鄂边革命根据地与江汉平原红色区域连成一片的设



想，1930年上半年，贺龙三次率红四军东进，7月初，与周逸群领导的红六军在红安会师。会师后，根据党中央指示成立红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兼第二军（由第四军改称）军长，周任政治委员。

贺龙重返洪湖后，就和周逸群制定了一个计划，以6个月为期，依靠主力红军、地方游击队、赤卫队三结合的武装体系，拔除洪湖根据地内的白军据点，建立根据地中心区域坚实基础，并迅速向敌人薄弱地区发展，使湘鄂西各小块根据地连成一片。

正当革命力量在洪湖辽阔的河湖港汊上与蒋军展开有声有色的游击战争时，中共长江局贯彻立三“左”倾路线，让刚组建的红二军团攻打沙市。鸡蛋碰石头的结果是，不仅无功，而且损兵折将3000人。

接着，长江局又让红二军团进逼武汉。有了教训的贺龙、周逸群未执行，党中央就派邓中夏来洪湖，全力推行“左”倾冒险路线。红二军团被迫南征，在松滋杨林寺遭遇强敌，红六军损失严重。

由于贺、周的努力，而邓中夏也是一个正派的干部，在一些时候能接纳贺龙的正确建议，红二军团也打了一些胜仗。

1931年初，红二军团改编为红三军，贺龙任军长，邓中夏为政委。他率领红三军转战荆（门）、当（阳）、远（安），开辟了以房县为中心的鄂西北苏区，接着三返洪湖，取得了龙王集、文家墩战斗的重大胜利，歼敌5000多名，红三军又恢复到15000余人。

而此时，一场新的厄运又降临到这支队伍和这片根据地。以王明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派夏曦来湘鄂西任中央分局书记兼红三军政委。从此，湘鄂西苏区开始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左”倾统治。夏曦先是号召红军以“布尔什维克的速度进攻”强敌，与之拼消耗；然后是命令将士用洪湖的沙土筑碉堡固守。同时不顾贺龙等反对，解散军队中党团组织，并错误地杀害了段德昌、宋盘铭、王炳南等大批好干部，把贺龙等在湘鄂西多年努力的成果毁得差不多了。到1934年4月，反“围剿”完全失败，红三军只剩3000余人，在无目标地游荡，先从洪湖退到豫西，又从豫西到陇东，再从陇东回到湘鄂边，不知还要游向何方。对夏曦的所作所为，贺龙抗议过，几次向夏拍过桌子，但夏是中央代表、政治委员，有最后的决定权，作为军长，贺龙无能为力。

但此时眼看着红三军濒于绝境，贺龙这个只有几年党龄的将军再



也不能忍受，他不禁又一次拍案而起：“野鸡有个山头，白鹤有个滩头，红军没有根据地怎么行呢？”他坚决要求建立根据地，恢复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处处碰壁的夏曦只好同意。

1934年5月开始，贺龙率红三军转移到川贵两省东部，先后攻占彭水、黔江、酉阳等地，创建了黔东革命根据地，红三军终于有了一块立足之地。

正是在这块根据地，贺龙迎来了从湘赣突围远征的红六军团。这次他和中央代表任弼时合作得很好，他又恢复了乐观、豁达、敢说、敢做的本来面目，他就像是回到了大地的巨人安泰，力大无穷，战无不胜。在他爽朗的笑声中，他指挥的红二、六军团捷报频传。

1934年10月底，贺龙计划发动湘西攻势，宣称要占酉阳，引陈渠珍的万人出洞。11月初，陈渠珍果然乖乖听话，见红军占酉阳，从老巢永绥、保靖调部向北行动。当上当受骗的敌人清醒过来时，远征疲惫的红六军团在永顺整整休息了一个星期。养足了精神，恢复了体力的红军指战员，迅速撤出永顺。贺龙派小股兵力像金钩钓鱼一样，且战且退，将敌人诱到距永顺城45公里的龙家寨，设伏于隘口两侧的大部队突然袭击，大获全胜，史称“龙家寨大捷”。这一仗毙敌1000多人，俘虏2000多人，缴枪2200多支，为红军创建湘鄂川黔根据地打下基础。

接着，贺龙率部又奔袭敌军阵地，包围常德、占领桃源、回攻慈利、解放大庸、收复桑植……贺龙和他的部队威震三湘四水，7000人的队伍牵制和调动了敌人十几师的兵力，有力策应了中央红军的突围和长征。

● 长征途中二、六军团没有蚀本，得益于贺龙的三次“神来之笔”

1936年11月的一天，黄土高原天高云淡。毛泽东在自己的窑洞里会见刚结束长征的贺龙和任弼时。

毛、贺两人是第一次见面，两人却是倾慕已久。贺龙后来回忆说，他是在1916年就听说过毛泽东，认定毛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敬仰得很。而毛泽东在三湾改编时，曾以贺龙两把菜刀起家的精神鼓舞士气，由此，使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的精神传遍神州。

这个时候，毛泽东对贺龙更是充满敬意。他微抬着头，望着贺、



任说：

你们二、六军团在乌蒙山里打转转，不要说敌人，连我们也被你们转昏了头，硬是让你们转出来了嘛！出贵州，过乌江，我们是付出了大代价的喔。二、六军团却讨了巧，就没有吃亏。你们一万人，走过来还是一万人，没有蚀本，是个了不起的奇迹，是个大经验，要总结，要大家学习。

的确，红二、六军团了不起。当初，他们从桑植刘家坪出发进行长征，共有 1.7 万余人。经过历时一年的艰苦跋涉、战斗，全军尚有 1.1 万人，与一、四方面军比较是损失最小的。

长征，是一场在退却中求生存的战争，它的成败得失与军事指挥员的决策能力、用兵艺术是休戚相关的。红二、六军团创造的奇迹，自然离不开广大指战员的共同努力，但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贺龙的三次“神来之笔”。

第一次是“声东击西”计。

1935 年 9 月，蒋介石调集 140 个团共约 30 万兵力，“围剿”湘鄂川黔苏区，妄图把长江以南仅剩的一支主力红军消灭掉。

敌人采取步步为营、逐步缩小包围圈的办法，红二、六军团难于找到有利的歼敌机会，根据地日益缩小，情况十分严峻。为打破这种局势，他们决定突围转移到黔东的石阡、镇远、黄平一带无堡垒、敌人力量较弱的地区，进行运动战，争创新的根据地。

问题是如何跳出这 140 个团的包围圈。在军分会上，任弼时知道贺龙点子多，让他拿个主意。贺龙想了想说：“我们突围后直奔贵州，蒋介石围攻我们的几十万大军便会盯住我们不放。屁股后头跟着十几万敌人，那可是很不舒服的喽！”

“你看怎么办？”

“我的意见，我们先到湘中去。那里地域辽阔，物产丰富。到了那里，一则可以补充物资，筹集款项，宣传抗日；二则可以威胁长沙，调动敌人。待敌人尾追过来，我们再杀他个回马枪，转入贵州。”

大家一致认为这是一着妙棋。

11 月 19 日，贺龙、任弼时下达了突围命令。二、六军团迅速冲破



了敌人两道封锁线，分别占领了辰溪、津市、溆浦、新化、蓝田和湘中著名的锡矿山，控制了湖南中西部不少地区。

12月11日，等敌人追上末后，红二、六军团又连续9天向东南急进，摆出东渡资水的态势。敌人果然上当，大批拥向湘东南。

与敌人打一仗后，贺龙率红军来了个“向后转”，回师直奔西北。时已隆冬，大雪纷飞，红军在崇山峻岭中日夜兼程，把敌人远远抛在后面，赶到芷江冷水铺，安安稳稳地过了1936年元旦。1月9日，按预定计划到达了石阡地区。

但是石阡地区地瘠民贫，敌人的15个师又追上来了，贺龙决定向黔西、大定、毕节地区转移。

一路上，贺龙故伎重施，率红军时南时北，时而作出欲取贵阳之态，时而示拟抢渡乌江之形，让敌人误以为贺龙要重走红一方面军老路，急忙调兵业守乌江，增防遵义。但贺龙却于2月2日率部向西巧渡鸭溪河，到了黔西县。这样，各路敌军又被甩在后边，只好隔江鸣枪“欢送”了。

第二计是在乌蒙山打转转。

红军占领黔西、大定、毕节三个县城后，开展建立根据地的工作，把这三个地区搞得红红火火。这气坏了蒋介石，他从南京飞来贵阳，亲自部署“围剿”，四面防堵。

大军压境，2月27日，贺龙率军撤离毕节，上了乌蒙山区。

乌蒙山南北走向，纵越云南东北和贵州西部，海拔2000多米，逶迤千里，群峰奔涌，气势磅礴。红军回旋其间，是为了转昏敌人，伺机出击摆脱敌人。

乌蒙山区的3月，寒气料峭。部队转战在渺无人烟的群山之中，非常的艰苦。贺龙的脚也裂了一寸长的口子。他的马驮着伤病员，自己却不肯坐担架，拄着一根棍子一步一颠地走着，每迈一步都疼得钻心。但他还不时给周围的人讲笑话，鼓舞士气。上行下效，部队始终保持着饱满的革命精神。乌蒙山的石壁上，各部队书写的标语随处可见，一条标语写的是：“踢死黔军，踩死川军，打死滇军，拖死中央军。”

战士们风趣地说：“什么叫乌蒙山回旋战？就是连打带走地消灭敌人，不管他什么黔军川军中央军，统统把他们肥的拖瘦，瘦的拖死，



叫他们统统见阎王。”

贺龙带着红二、六军团与敌人在乌蒙山转了近一个月，把敌人转得昏头转向，拖得疲惫不堪，当越聚越多的敌人在乌蒙山紧缩包围圈时，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隐蔽地从敌人的结合部钻出去，直奔滇东，去捅龙云那个马蜂窝。

最后一计是佯攻昆明，巧渡金沙江。

根据贺龙的命令，红二、六军马裹蹄，人衔枚，悄悄地从敌人两个纵队的夹缝中跳出包围圈，兼程急进，在昭通、咸宁之间穿过孙渡的防线，直奔普渡河。4月6日，攻占寻甸。

龙云判断红军可能从元谋渡江，他急从昆明调所有滇军赶到普渡河两侧防堵，又令孙渡纵队加速追击，将红军阻拦在普渡河东岸。此举是防蒋介石玩“假道灭虢”的惯伎。

滇军倾巢出动，红军很难渡过普渡河北上。贺龙说：“龙云把老本都掏出来了，把牌押在普渡河，他那个省会昆明就成了空城。他唱空城计，我们又不是司马懿，没有那么胆小，我们就打昆明，龙云，还有那个顾祝同，准会吓得灵魂出窍，把兵调回昆明。这时候，我们一掉头向西，甩掉了滇军，可以到石鼓、丽江去过金沙江。江是死的，人是活的，何必一定要到元谋去渡江呢？”

大家一致称这个主意大胆又巧妙。

4月10日，二、六军团掉头南下，直扑昆明。当天先头部队出现在距昆明15公里处。第三天，两军团全部进入距昆明20公里的富民城，摆出一副即将攻打昆明的架势。

这可吓坏了顾祝同和龙云。顾向蒋介石求援，龙云更是十万火急地调普渡河的滇军回防昆明。

当滇军急如星火地回保昆明，贺龙却率军转向滇西，日行百里，横扫滇西，补充给养，扩大队伍，向金沙江迈进。

这时敌人才惊呼上当，但再拼命追也赶不上，气得顾祝同直骂娘。

25日，红军前卫部队到达石鼓。28日晨，全军17000余人全部过

江。滇军刘正富旅匆匆赶到金沙江边，但他们所见到的是红军在江边石壁上的一副醒目对联：



来时接到宣威城，费心，费心！

走时送到石鼓镇，请回，请回！

红二、六军团过江后进入藏区，7月初在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贺龙、任弼时等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作斗争，促成了红四方面军的北上。从此，三个方面军团结一心，同唱抗日救国曲。

●“我们要像孙猴子那样，到华北抗日前线去，闹他个天翻地覆”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在十年内战中互相敌对的国民党和共产党为了民族的利益，终于携手抵抗外侮。贺龙坚决拥护中共中央的抗日主张，他说：“我们就要像孙猴子那样，到华北抗日前线去，闹他个天翻地覆，使日本鬼子不得安宁。”

但是当时许多干部战士对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思想不通；红军和国民党军血战十年，仇深似海，现在却要改编成为他们的一部分，穿上灰军装，戴上青天白日帽，这打心眼里就反感。

为了说服大家，贺龙联系自己的经历给将士们做工作：“就我本人来说，国民革命军的军装，过去我穿过；青天白日帽徽，过去我戴过；青天白日旗，我也打过。有人说，我是将军不当当红军，皮靴不穿穿草鞋，高楼不住钻芦苇。可是，他们哪里知道，当红军，穿草鞋，钻芦苇，是我的心愿。算起来，从大革命失败到现在，我已经闯荡十年，跟国民党斗了十年。现在国难当头，为了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共同对付帝国主义，我愿带头穿国民党发的衣服，戴青天白日帽徽，和国民党部队统一番号。这样，看起来我们的外表是白的，但我们的心却是红的，永远是红的。”

“白皮红心”这句话非常的生动深刻，既解决了大家的思想问题，又成为大家行动的指南。几十年过去后，一些白发苍苍的老战士仍记得这句话。

9月，贺龙和关向应把一二师分出一部分留在陕北保卫党中央，自己却率主力东渡黄河，去了晋西北的管涔山区，抗日的第一线。

开始，由于一二师力量弱小，主要是配合友军作战。为配合国民党军的忻口之役，9月底，一二师袭击井坪、平鲁，威胁大同。贺指挥所部在雁门关附近伏击日军运输队，毁敌汽车百余辆，歼敌500余人，



收复了雁门关，切断了敌人由晋北到忻口的后方交通线，声威大振。事后，指挥这次战役的卫立煌由衷地说：“八路军把敌人的几条后路都截断了，对我们忻口正面作战部队帮了大忙！”

1938年2月，贺龙部又以主力配合友军反攻太原，在同蒲铁路阳曲至忻县段开展交通破袭战，圆满完成任务。3月，一二师主要依靠自己力量，打破了万余日军对晋西北的围攻，收复了7座县城，歼灭日伪军1500余人，缴获不少。这些胜利稳定了晋西北局势，保障了陕甘宁边区的安全，打出了八路军的威风。

然而，更让延安振奋、重庆惊愕的是贺龙率一二师大闹冀中。

1939年1月至8月，贺龙遵守党中央关于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千里跃进冀中，在此大显身手，8个月里打了许多胜仗。

冀中，位于南北交通大动脉平汉、北宁、津浦三条铁路之间，沃野千里，河道纵横，村镇密布，人口众多，紧靠日军华北侵略军大本营——北平，是日军重点“清剿”地区。1939年，日军在此集中了3个师团，进行大规模“机敏、神速的讨伐”。而贺龙只从晋西北带来了3个团的兵力，加上后来在冀中发展的也只有主力部队两个旅。敌我力量对比悬殊，贺龙就采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盘旋打圈子的作战方式，避实就虚，寻找战机，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曾在一个月內，先后在曹家庄、大曹村、黑马张庄等地四战四捷，歼灭日军400多人，粉碎了日军的围攻，打击了敌人的气焰。

日军大为惊恐，惊呼：“贺将军此来，对北支那之威胁更非昔比，尤其直接威胁平津，不容坐视，必须立即覆灭其势……”

到冀中作战几个月后，部队有所扩大，也增加了不少平原作战的经验，贺龙便摩拳擦掌想打一打大一点的运动战。

说来也巧，贺龙想打仗，机会就送上门来了。4月20日那天，贺龙正在大朱村的司令部召开旅以上干部会议，侦察员赶来报告，说日军二十七师团第三联队之吉田大队800余人，伪军数十人，随带80余车弹药、粮食从沧州出动，向北运动。

吉田大队是新从华中战场调来的所谓“功勋联队”，很有战斗力。

收到情报，贺龙意识到“送礼”的来了。他和关向应、参谋长周士第分析，吉田大队可能要在任邱、吕公堡等据点日军配合下，扫荡河间以北一带。河间周围的敌人不多，而我方有7个团，可以吃下这



800人的正规军。他决心抓住这个机会，打一个歼灭战。

不出贺龙所料，4月23日7时，敌吉田大队800余人，由三十里铺出发，渡过古洋河，向齐会村发起攻击。驻齐会村的七一六团三营被包围在村内，与敌激战。

贺龙的作战计划是：以一部扼守齐会，吸引敌人，再集中优势兵力，对敌人实行反包围，歼灭敌人。

在齐会严阵以待的七一六团三营利用有利地形层层阻击敌人，与敌人争夺每一间房屋，大量杀伤敌人。吉田大队进入华北就遇到这样强硬的中国军队，气急败坏，施放毒气，焚烧民房。

贺龙担心吉田攻不下齐会，要迅速撤走，那样，他的整个计划就要泡汤，带几个参谋人员来到前沿阵地，用望远镜观察战况。突然，几发炮弹打来，在他身边爆炸。贺龙头一阵眩晕，倒在地上。这是敌人打来的毒气弹。医护人员慌忙抬来担架；但贺龙只是戴上了一个用尿蘸过的口罩——这是战士们发明的防护毒气的土办法，对人们说：“莫慌嘛，我没得事，不要管我。”休息了一会，又去观察战况、指挥战斗。

贺龙判断，天一黑，齐会之敌可能会趁夜间逃跑。于是命令部队调整部署，加强力量，在黄昏时发起总攻击。敌人依托房屋和村沿工事进行顽抗。到凌晨，坚持不住的残敌向南突围。

贺龙早料到敌人可能会南逃或西撤，所以在部署兵力时，已命令七一五团和第二团的一个营，在此前至刘古寺、西保车一线设伏；独二旅之四团到四公村、杨庄设伏；第五团的一个营在张庄附近设伏。贺龙说：“这叫连环套，大包围套小包围。”所以刚逃出“天罗”的敌人又撞入了我军的“地网”，在我军的猛烈的打击下鬼哭狼嚎。

经过两昼夜的战斗，敌人死伤大半，仍利用坟地、树林等掩护顽抗。为减少伤亡，贺龙下令白天围困，黄昏再进攻。

原本设想敌人连续在野外作战，伤亡惨重，饥渴交加，恐慌万状，待发起总攻，必可全歼。谁知天有不测风云，时近黄昏时，平原突起暴风，狡猾的吉田利用天昏地暗的大风乘我军不备，率80余名残兵钻出包围圈跑掉了。

一锅煮熟的鸭子又飞跑了几只，贺龙非常遗憾。

齐会大战，经三昼夜激战，歼灭敌人精锐700余人，在平原地区



打击了日寇的气焰，也揭穿了顽固派指责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谎言。蒋介石也不得不发来嘉奖电，电中说：“河间战斗中，贺师长杀敌致果，奋不顾身，殊堪嘉奖。”并发给他3000元医疗费，“以资疗养”。

此后，贺龙率一二师继续活跃在抗日前线“大闹天宫”，用谢觉哉的话说，“日本鬼子没奈何他”。

● 西北战场的总“粮草官”

1947年3月，蒋介石在全面进攻解放区严重受挫后，集中兵力对山东和陕北实施重点进攻。仅西北，蒋介石集中了34个旅23万人，准备入侵陕甘宁解放区，攻占延安，用国民党的话来说，是要“摧毁匪方党、政、军神经中枢，动摇其军心，瓦解其斗志，削弱其国际地位”。

当时，陕北解放军只有4个野战旅，约1.7万人，敌我力量悬殊。3月19日，我军主动撤离延安。中共中央和陕甘宁领导机关一部分撤到了贺龙的晋绥解放区。

陕北面临大战。贺龙是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保卫延安的雄壮进行曲原本是应该由贺大帅去谱写的。不巧的是，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毛泽东已让贺大帅“下山”去当晋绥野战军司令了；而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担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彭德怀是个急性子，他向毛泽东毛遂自荐，提出：“在贺龙同志未回延安之前，陕北几个旅加上后勤人员也不过两万人，是否由我暂时指挥？”

彭大将军毛遂自荐，中央军委就组成了西北野战兵团，由彭任司令员兼政委。这样，保卫延安的主角就变成了彭德怀。

贺龙一切以党的大局为重。当年他把一二师的五分之二留在延安，保卫党中央，现在他也一样大公无私。晋绥野战军只有3个纵队，1946年11月，中央军委已调走一纵队去陕北，此时又要调一个纵队开赴陕北，贺龙不折不扣地执行，亲自送王震部西渡黄河。他还捎话给一纵队司令员及政委说：“你们的任务很光荣，毛主席在陕北，要保证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安全。要多打胜仗，多消灭敌人，听彭老总的指挥，这样才对得起党和人民。”

贺龙送走了部队，退居幕后，但他的任务却非常的艰巨：他统率的部队仅一个野战纵队、一个骑兵旅以及10余个地方团队，既要保卫



和巩固晋绥解放区，又要为陕北战场输送人员、物资，保证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在晋西北机关的工作与安全，还要配合友邻解放区作战，保障中共中央与各解放区交通的通畅。你说这担子有多重？

3月底，周恩来来三交镇会见贺龙，传达中共中央枣林沟会议决定。他对贺龙说：中央机关来河东的人员、单位一大堆，还有许多老同志、妇女和孩子，事情很麻烦，一切要依靠你来安排。

贺龙说：你放心，我亲自负责，保证他们的吃住和安全。

周恩来笑了。他了解贺龙，这位老总从来是说到做到。

其实，这件事目前对贺龙来说还只能算是小事，大事是如何保证西北战场所需要的弹药、粮草给养及补充兵源，让彭德怀放手去打胡宗南。这个重任毛泽东7月份在靖边县小河村开会时交给他的，让他统管陕甘宁晋绥两个区工作，作西北战场的总“粮草官”。

而在此之前，彭德怀已伸手求援了。5月10日，西北野战军正集结延安以东，伺机杀敌，急需弹药。贺龙跟李井泉商量后，急送各种炮弹2000发去陕北。此后，他又下令后勤部门送去三批武器弹药，以解彭德怀的燃眉之急，自觉地做起了西北战场的供应部长。

可是，晋绥地区的军事工业规模不大，条件也差，很难保证供应量。他想到陕甘宁也有军工企业，那是抗战时期搞起来的，有不少人才。目前，陕北战火连天，已无法生产，为什么不把两个地区的军事工业合在一起呢？于是贺龙请人转告习仲勋，提议将河西军工厂迁到河东，集中人力、物力生产，满足前方之急需。

习仲勋与彭德怀觉得贺龙很有战略眼光，拍手赞成。此后，合并后的晋绥军事工业得到相当发展，到1948年已有14座工厂，一所工业学校，3500多名职工，年产山炮弹4000余发，两种型号的迫击炮7.5万发，加上从运输大队长蒋介石那里缴获一部分，基本上满足了战争的需要。

武装弹药供应找到了办法，重要的还有粮食问题。当时，西北野战军，加上中共中央、陕甘宁边区各机关、部队、学校及游击队共8万余人，每月需1.6万多石粮食，这不包括晋绥军区部队和地方工作人员所需粮食。而陕甘宁、晋绥两区加在一起，人口仅400万，而且，黄土高原土地贫瘠，农业生产落后，产量很低。加上近年来陕北和山西缺雨，旱灾严重，粮食只收到丰年的四五成。这可真急煞了贺龙。